

百年變遷：清初《盛京通志》 的編纂及其內容探析

鄭永昌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提 要

在以往東北區域史的研究中，《盛京通志》無疑是學者撰文的重要參考史料，然而就《盛京通志》一書本身，有關其版本與內容的相關研究，至今卻寥寥可數。目前存世《盛京通志》共計五部，編纂時間經歷清初康熙、雍正與乾隆三帝，時間上起十七世紀八〇年代初，下迄十八世八〇年代末，適近百年的歲月，充份體現清朝官方修纂盛京地區歷史的具體觀點，同時反映出百年間盛京地區的人文與政經變遷情況。

上述五部官方纂修的《盛京通志》，計有康熙二十三年刊本、五十年修補本、乾隆元年增輯本、乾隆十三年重修本以及乾隆四十九年的增補本。本文即試圖透過此五部通志資料，深入探析其編纂的歷史背景、版本傳鈔增補過程、以及內容所反映大清王朝十七、八世紀百年間對陪都盛京歷史變遷的紀錄。

關鍵詞：東北、盛京、陪都、盛京通志、歷史變遷

前 言

盛京，作為清代入關前重要的政治都城，¹ 入關後的陪都，² 其在清代都城史上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康、雍、乾三帝經常提到盛京為國朝龍興之處、發祥之地、滿族根本重地，可見其在清代帝王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從關外時期盛京肩負起的政軍角色，逐漸蛻變為入關後清廷極力突顯其保存滿族文化的重鎮，因此有關該地的歷史撰述，自然倍受關注，其重視程度與其他省份有顯著不同。³

《盛京通志》，是一部由清代官方主持編纂，紀錄關外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疆域範圍、建置沿革、職官衙署、兵防關隘、山川物產、戶口財賦、古蹟名勝以及藝文人物各方面之地方文獻。其內容豐富、取材廣泛、考核精詳，向來即為清史學者研究東北區域史、關外軍政制度、社會與財經變遷、民族人口、風俗異聞以及教育文化發展的重要參考典籍。

清朝統治者視東北為龍興之地，因此對《盛京通志》的編纂自然格外重視。目前所知清代時期東北地方志書約計三十種，主要是在康雍乾三朝由官方主持編纂而成，⁴ 而最初撰修的背景，是與朝廷推動《大清一統志》編纂工作具有密切的關係。⁵ 府州縣志是編纂全省通志的基礎，而通志又是纂輯一統志的必備資料。《一統志》編撰工作的完善與否，地方通志編寫的優劣即起著重要關鍵作用。東北地方志書的撰寫中，由於當地高層長官領銜監修督促下，取材豐富，成為當時中央視為掌握關外最重要的情報，今人研究東北區域的核心資料，《盛京通志》當是最重要的素材與編纂質素最高指標。

1 有關改瀋陽為盛京的確切時間，據杜家驥依據《清太宗實錄》、《清太宗本紀》與《滿文老檔》等史料考證，盛京一名具體確立時間應在天聰八年（1634）。見杜家驥，〈清改瀋陽為盛京考述〉，《滿族研究》，1997年4期，頁36-37。

2 將盛京作為陪都，是在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閏六月，見（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8，順治二年閏六月壬辰條，頁171；另有關盛京作為清代陪都的論述，參見丁海斌、時義，《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14-15。

3 邱富生，〈遼寧方志述略〉，收入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編，《中國地方史志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82；又參劉曉玲，〈清康熙朝東北方志文獻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4 薛虹，《中國方志學概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頁36-38。

5 目前有關清代《大清一統志》纂修的研究論著可謂相當豐富，除一般討論清代地方志書的出版著作中均有敘述外，而較深入的專門論述可參見喬治中，〈《大清一統志》的初修與方志學的興起〉，《齊魯學刊》，1997年1期，頁115-122；張豔玲，〈三部《大清一統志》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03）；牛潤珍、張慧，〈《大清一統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2008年1期，頁136-148。

目前所見《盛京通志》一書版本，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起，迄乾隆四十九年（1784）間，共編成《盛京通志》五部，分別有康熙二十三年刊本、五十年補修本、乾隆元年、乾隆十三年以及乾隆四十九年各刊本。金恩輝主編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收錄康熙至乾隆年間現存的《盛京通志》即有五種，個別扼要地介紹各刊本之纂輯背景、編修作者以及內容體例，成為我們初步掌握此書重要線索。⁶

以往有關清代東北區域史研究上，《盛京通志》一直是重要的參考文獻，然而，除三十多年前陳加〈盛京通志纂修考〉一文對該志編纂者，版本流傳與價值作扼要介紹外，繼後相關專門論述卻寥寥可數。⁷

五部《盛京通志》，其編纂起迄自十七世紀八〇年代至十八世紀八〇年代，時間恰值百年。在此百年間東北歷史時空隨著滿族入關發生許多重大的變遷。盛京歷史的書寫，主要出自官方主持監修，其書寫體例與刊行，內容逐步增補擴充。本文將試圖透過上述五部通志的內容，深入探析其版本傳鈔增補及其內容修正背後所反映大清王朝十七、八世紀間陪都盛京地區的政治軍事、人口流動、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發展各面向，進一步了解清初百年間國家與地方，滿族與漢族、經濟與文化的變遷歷程。

一、五部《盛京通志》的編纂背景

盛京通志編纂的背景，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為配合中央編纂《大清一統志》而牽起地方撰志活動；二是隨著時間發展，後志補充前志不足之處，接續相承，在體例與內容上增補重修；三是隨著皇帝謁陵祭祖的東巡活動，中央試圖藉由對東北龍興之地的重新書寫，喚起滿族歷史記憶的文化政策。

一統志的編纂始於元代，明代繼之，而清代沿襲前代撰修一統志傳統，同時為有效掌控全國各地情況，體現全國一統局面的功績。隨著清初國內戰爭的相繼平息，清朝政權逐步穩定，撰修一統志的呼聲亦隨之浮現。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1612-1675）上疏奏稱：

6 金恩輝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臺北：和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冊上），遼寧省，頁5-7。

7 目前所知單篇討論《盛京通志》纂修的專門著作，有陳加的〈盛京通志纂修考〉一文。陳加，〈盛京通志纂修考〉，《圖書館學刊》，1980年3期，頁50-57。上引金恩輝主編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中東北方志部份的撰述，同樣也是由陳加負責執筆。

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勢、戶口、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宜匯集成帙，名曰《通志》，誠一代之文獻。然迄今各省尚未編修，甚屬缺典，何以襄我皇上興隆盛治乎？……請敕下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今，纂輯成書，總發翰林院，匯為《大清一統志》。⁸

康熙帝接納了衛周祚的建議，並下令各省設館從事通志的編寫工作。據當時李衛所監修的《畿輔通志》中亦記載：「康熙十一年，大學士衛周祚奏令天下郡縣分輯志書，詔允其請。」⁹

然而未久，三藩之亂的爆發，各省修志活動因戰事影響而受阻，修書成果寥寥。據白潢在《西江志》序言即指出：「本朝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曾奉修志之檄文，繼值逆藩變亂，遂爾中輟。」¹⁰直到康熙二十年代初期，隨著三藩之亂勦平與臺灣明鄭政權內附，反清勢力大致平定。為昭一統之盛，垂一統無疆之業，朝廷官員建請編修一統志的主張又再次提上日程。當時大學士明珠具奏說：

《一統志》關係典制，自應催令速修。從前用兵之際，各省所修通志稍覺遲延。今兵事既息，俟各省修完送到之日，應即行纂修《一統志》書。¹¹

康熙二十二年（1683），隨著國內戰爭局勢的穩定，清廷接受了明珠的建議，再度諭令各省編纂通志，並限期三月內彙報上呈。這道諭令，使得受三藩之亂影響而停頓下來的纂修志書工作又再度活躍起來，也因此成為開啟盛京官員修輯通志的契機。¹²為貫徹朝廷編修省志的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所刊行的《盛京通志》，正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並成為清代東北地區由官方主導刊行的首部通志。書前分別收錄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至五月間，由奉天府府尹董秉忠、陞任府丞邊聲廷、繼任府丞張鼎彝以及錦州知府孫成各寫的序。序言中，甫就任奉天府府尹的董秉忠即寫道：

8（清）萬邦維修；衛元爵等纂，《萊陽縣志》（康熙十七年刻本），卷首，〈奉上修志敕文〉。轉引自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頁112。

9（清）李衛修，《畿輔通志》，收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史部二十四，地理類一，卷68，頁53a。

10 自巴兆祥，《方志學新論》，頁113。

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2，頁988-989），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

12 薛虹，《中國方志學概論》，頁26-27；邱富生，〈試論清代方志的纂修〉，《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4期，頁78。

臣秉忠以叨簡命，作尹奉天，乃奉詔偕鎮帥臣督輯通志事。書成，將拜手獻之闕廷。……稽之昔乘，未有專書若是乎！¹³

開宗明義揭示出此書實為清代東北地區由官方主導而寫成的志書。至於府丞邊聲廷序言內容則對此書撰寫背景上有更具體清楚的描述：

國家何以有志哉？志以紀方土形勝，人官物曲，迄於英賢文行，上追遼古，下詔來茲而已。志成，獻之於上，迺命詞臣裒集大書，名曰《一統志》。則統志以天下言，通志以一省言，不越戶庭而周知海內者，志為之也。……盛京為根本重地，帝業之所由來，日昌日熾，通志更不容已。奉命纂輯，良已有年，祇以舊籍靡稽，艱於速就。去年夏六月京兆臣董秉忠甫任，即檄令各屬咸至，量能授事，分類采輯。或稽之裨史，或詢之老成，覆取各屬新志，增刪訂正，詞尚質實，義貴顯明，數閱月而稿成，快雖簡約，大義悉該，尋付梓。¹⁴

邊聲廷指出，各省雖為配合中央一統志編纂而受命撰輯通志多年，惟以往因編纂資料徵集與考訂耗費時日，終於在府尹董秉忠積極推動與監督之下，遂在短短半年時間內完成付梓。然而，盛京作為國家陪都，其地位自有別於他省，因此一統志的編排，益突顯出盛京作為國家重要都城的身份地位。如繼任奉天府丞張鼎彝序中提到：

我皇上宵旰圖幾，禮明樂備，追述祖功宗德，纂修《大清一統志》，以昭來茲。爰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以便彙輯，為諸省弁冕。¹⁵

作為諸省魁首，盛京地位遂在官方主持的地方志書中突顯出來，也表示出清朝的政治重心雖隨入關後移往北京，但盛京仍然具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

康熙五十年（1711），距離首部《盛京通志》問世已將近三十年的光景。當時奉天府府尹廖騰燿日夕披閱之餘，有鑑於舊志頒行日久，書版因刷印數量龐大而版面漸趨模糊，遂有製版重刻之意。據廖氏指稱：

13（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董秉忠序〉。

14（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邊聲廷序〉。

15（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張鼎彝序〉。

盛京之有通志也，所以弁冕諸省，而誌太宗之勛業垂統、根本鴻圖，猶《詩》之冠以〈周南〉也。……康熙二十二年我皇上纂修《大清一統志》，特敕奉天府尹臣董秉忠協同鎮帥督輯成書，歷有年所。……爰取通志一書朝夕披讀，恍如目覩邠岐豐鎬之盛。惟是此書頒行日久，印刷滋多，梨木蒙翳。臣謹會同府丞臣呂履恒、治中臣李舜卿、通判臣嚴舒、並府州縣臣唐之夔、盧兆鵬、李尚隆等協力訂正，鈐版一新。¹⁶

廖騰燿主持刻印的《盛京通志》，其凡例、綱目以及卷次雖率以舊志為準，因此以往皆視之為舊志的重刻本。然而若對兩者內容加以比對，則後者在職官與藝文兩卷所增補之處亦復不少，是以康熙五十年的《盛京通志》，應視為舊志的修補本而非重刻本。當時負責刊印的盛京官員，無疑希望使《一統志》的內容能更為詳實，但終康熙之世，《一統志》的編纂幾經蹉跎，隨著朝中主修《一統志》的大臣徐乾學與韓菼相繼去世後，最後僅編得底本而未見成書。¹⁷

康熙年間地方各省熱切響應中央編纂《一統志》的文化政策雖未能實現，但對往後一統志的編修仍發揮一定的奠基作用。雍正六年（1728），鑑於前朝一統志久未成書，而已經繳送的志書又因年代久遠，內容與實際情況亦已有相當差距。在大學士蔣廷錫的奏請之下，雍正帝乃再度諭令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須詳細確核，以符合當時情形。惟考慮到內容既求完備，自不應立定時程。諭旨中即提到：

今若以一年為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若一年未能完成，或可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¹⁸

正由於諭旨給予較寬的期限，對盛京官員而言適得以在較為從容情況下重行修輯，以求內容精詳勻當，卻也難以避免出現前後任官員的推諉拖延。這種現象在雍正九年剛就任奉天府府尹楊超曾（1694-1742）奏摺中即得到充份印證：

臣查閱舊刻《盛京通志》，係康熙二十三年纂輯刊刻。經今四十餘載，字已模糊，事尤缺略，自應仰遵諭旨，重加修輯，以成完善之書。但查此案

16（清）廖騰燿等增修，《盛京通志》（康熙五十年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廖騰燿序〉。

17 康熙年間所編纂《一統志》的底本，目前存世者僅見收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二冊與天津圖書館十三冊。參秦麗娜、季秋華，〈彌足珍貴的康熙本《大清一統志》〉，《圖書館建設》，2001年6期，頁105-106。

18（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122），卷75，雍正六年十一月甲戌條。

部文奉到已將三載，其作何修輯之處，前任並未議及。¹⁹

在楊超曾奏摺中，他並未提及康熙五十年府尹廖騰燿重刻的本子，或許他直接將後者與康熙二十三年所刊的《盛京通志》視同一書，但也反映楊超曾對盛京歷史文獻似乎未給予太多的關注。當楊超曾上任後，諭令修志的年限將屆，因此他在摺中又進一步說明：

臣雖甫經任事，何敢以奉旨交辦之事因循推諉。除現在諮訪故實，悉心料理外，所有遲延緣由理合繕摺奏明。²⁰

然而楊超曾任上是否有實心執行？看來應該沒有。四年後，直到繼任的呂耀曾、宋筠兩位府尹任上，重修的《盛京通志》才刊行問世。乾隆元年十月，奉天府府丞王河書中序言上提到：

伏惟本朝《一統志》典制所昭，久有成書。今經數十餘年，化與日新，治僭時懋，規劃益加宏遠，采輯更宜精核。盛慮周詳，爰詔直省重加增訂，次第獻之闕廷。……自夏至冬，五閱月而稿就，直奉天府尹臣宋筠到任，相與商確論定，而各處覆詢之事，與遠徼之所幫詳者，又以次俱到。因復原纂輯諸臣細加校讎，益為增補，又七閱月再初稿而後成。²¹

雍正皇帝為貫徹康熙皇帝未竟的心願，下旨再度編纂《一統志》，並重新啟動各省修志工作。歷經多年，各省雖已陸續將纂成通志進呈，但仍未能見到《一統志》的成書。康雍年間長達四十年的《盛京通志》的編修工作，始終與中央為貫徹《一統志》的纂輯工作。雖然一統志直到乾隆五年（1740）歷經三代終於頒行，²² 但卻為《盛京通志》累積了三部的成果。

《盛京通志》的編纂進入乾隆朝以後，其重修的背景與康雍時期相較具有明顯的不同背景。假如說康雍時期《盛京通志》的撰寫是配合朝廷纂輯《一統志》，乾隆時期重修《盛京通志》則有其更為深刻的文化與政治因素，其與乾隆時期為求重振滿族文化，盛京作為滿族根本之地，清朝龍興之處而被重新賦與不同的意義。

19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奏摺，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文獻編號40200250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奉天府府尹楊超曾奏摺，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21 （清）呂耀曾、宋筠等纂修，《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王河序〉。

22 張豔玲，〈三部《大清一統志》的比較研究〉，頁5。

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首次以謁陵祭祖之名東巡盛京，其規模之盛，隊伍之大，綿延數十里，較康熙年間東巡聲勢更為浩大。在這次巡幸過程中，乾隆帝特意寫下著名的〈盛京賦〉，內容大力頌揚東北為滿族發祥聖地，在追念歷世祖先締建大清王朝艱辛之餘，並訓示子孫克慎守成，維護大清基業。〈盛京賦〉撰寫以後，乾隆皇帝即以此賦為主體以不同形式展開了多樣性的文學創作，除了乾隆八年武英殿刊滿漢文〈盛京賦〉、乾隆十三年滿漢文〈御製盛京賦〉三十二體篆文的創製外，而朝中文學詞臣也以各自書法，迎合譜寫乾隆帝的偉大文學創作。²³

從乾隆八年到乾隆十三年，隨著乾隆皇帝重返盛京後，對東北滿族文化發源地注入深切的緬懷，壯麗山河、阜盛物產、宏偉陵寢與樸實殿宇，在關外祖靈與山川神祇的庇祐下，東北的沃土孕育使滿族世代蕃衍，天眷盛京喻示皇朝的永固長存。重振盛京文化遂成為乾隆帝念茲在茲的心願，授命朝廷大臣重新撰寫《盛京通志》，無疑是順應著皇帝心理的必然結果。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乾隆十三年參與編纂滿漢文三十二種篆體《御製盛京賦》的總裁官之一的汪由敦（1692-1758），正是乾隆帝下令重編《盛京通志》的主要負責官員。

乾隆元年成書的《盛京通志》由於始修於雍正年間，當然不應算是乾隆皇帝下旨的成果。但分別成書於乾隆十三年與四十九年兩部《盛京通志》，則充份傳達出乾隆帝意欲彰顯盛京作為龍興之地的特殊位置。與滿漢文三十二種篆體《御製盛京賦》出版的同一年，汪由敦也奉旨完成了乾隆朝第一部《盛京通志》的刊行。²⁴汪由敦在成書後所上的〈盛京通志表〉中提到此書重修的原因：

臣等奉敕纂輯《盛京通志》恭呈欽定。繕寫告成，臣等謹奉表恭進者。伏以皇猷建極瑤圖，尊天作之區；聖治崇文寶冊，煥帝臨之宅。……固已萃一統之車書，備萬邦之圖籍。迺念瀋陽之域，實為王氣所鍾。……沿及本朝，巋然都會，鴉青啟瑞，河山開百代之基，鴨綠凝祥風雨，壯三韓之勢，比周京之岐畢，梓木千尋，擬唐室之晉陽，李花一樹。顧此秀靈之壤，可無紀載之編？乃前朝之舊志雖存，既嫌荒略；昭代之成書具在，

23 林士鉉，〈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367期（2013.10），頁52-67。

24 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資料庫中著錄此部《盛京通志》為乾隆十二年，不著撰人。但據陳加從乾隆四十九年《欽定盛京通志》卷128收錄汪由敦所寫的〈盛京通志表〉中有「志龍興之重地，纂成適逢辰年」等句所知，此書應是汪由敦負責主持編纂，成書時間應為乾隆戊辰（十三年）。參金恩輝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遼寧省〉，頁6。

復涉煩訛。爰降明諭，重修善本，期體裁之簡當，載筆綦嚴。約部分於整齊，操觚特慎，發凡起例，規撫悉稟乎睿裁。別類分門，摭採盡衷於欽定。²⁵

表文中雖然指出以往舊志失於荒略與煩訛，但究竟所指的是那一部《盛京通志》的闕失，表文卻未具體說明。但從字裡行間可知，此部《盛京通志》實由乾隆皇帝主導規劃，無論凡例的製定，門類的選擇，悉出自「睿裁」與「欽定」。而更重要是，盛京作為「天作之區」、「帝臨之宅」，當乾隆八年皇帝首次東巡後，親歷其境，親履其地，白山黑水，鴨綠秀麗，緬懷祖先創業，滿族發祥聖地，對於大清王朝「肇興之處」，猶如西周早期發跡於岐山，自應大書特書。對於前朝刊行的書志，是否真的失於荒略，復涉煩訛，看來不過是為重修《盛京通志》尋找理由。乾隆帝的真正用意，無疑是希望透過《盛京通志》的重新書寫，試圖喚起滿族的歷史記憶，凝聚滿族文化共識的手段。

進入乾隆四十年代，乾隆皇帝又再度以同樣的理由下令廷臣重編《盛京通志》。在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三間，當乾隆皇帝正準備起程赴盛京進行第三次東巡前夕，對軍機大臣下達了一道諭旨：

舊本《盛京通志》敘事簡略，體例亦多未合，著交軍機大臣派員重行纂輯，書成後交武英殿刊刻。²⁶

這次編纂的工作主要交由大學士阿桂（1717-1797）負責，從四十三年下令敕修，至乾隆四十九年付梓，歷時六年，堪稱清初各部《盛京通志》中最為詳細，載圖最為豐富的本子，向來為研究清中葉以前東北歷史的重要參考文獻。據阿桂在書成後一如往例上進表文中指出：

臣等奉敕重修《盛京通志》，恭呈欽定。繕寫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璇圖出震自東，基式廓之模；松牖秉乾從朔，緬厥初之緒景。發祥於先葉，永懷締構艱難，臚紀實於陪京。備見謠風淳古，千盤陵寢，天成虎踞之形；一統山河，地是龍興之舊。諏時巡而稽典，敬展珠邱，訂前志以勒書，輝騰壁府。續承事鉅，蒐輯體嚴。……爰補志乘編摩之闕，重煥丹

25（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128，「國朝藝文十四」，頁23a-25a，汪由敦，〈盛京通志表〉。

26（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內府朱絲欄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青。……前此已具成書，尚多簡略，今茲重遵申命，尤慎參稽蓋紬金匱於五朝，……奉聖裁斯，裒編克成善本。……體例從新，鉅細稟承賤素。分披乙夜後，先告葳汗青，再構辰年，伏願頒惠藝林，垂芬書庫。²⁷

從表文敘述內容來看，阿桂編纂《盛京通志》的背景實質上與汪由敦當時的動機並無太大差異，從乾隆十三年至四十三年間，歷經三十年的時空變化，盛京一地在政經與社會方面確實產生許多變遷。隨著乾隆皇帝足跡所到，試圖為滿族重新建構起關外故土的集體意識，同時也為後世留下東北歷史的豐富紀錄。茲據以上所述康熙至乾隆年間《盛京通志》各刊本資料扼要整理見表一，如下：

表一 康熙至乾隆年間《盛京通志》各刊本表

	盛京通志	盛京通志	盛京通志	欽定盛京通志	欽定盛京通志
版本	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刊本	康熙五十年 (1711) 補修本	乾隆元年 (1736) 刊本	乾隆十三年 (1748) 武英殿 刊本	乾隆四十九年 (1784) 收入 乾隆年間《四 庫全書》文淵 閣寫本
典藏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編纂群	伊把漢、董秉忠等	廖騰燧、呂履 恒等	呂耀曾、宋筠、 王河等	汪由敦等	阿桂、劉謹之等
冊數	6	6	10	12	57
卷次	32	32	48	32	130
門類	32	32	34	35	37
附圖	7	9	14	13	35
序跋	奉天府府尹董秉忠序 陞任府丞邊聲廷序 繼任府丞張鼎彝序 錦州知府孫成序	奉天府府尹廖騰 燧序	奉天府府丞王 河序	無序跋，另有表	無序跋，另有表

說明：各刊本卷次詳細內容整理如文後附表二。

27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首，阿桂，〈欽定盛京通志表〉。

二、《盛京通志》各版本內容及其編纂體例

(一) 康熙二十三年的《盛京通志》

此志為清代第一部為配合朝廷編纂《大清一統志》所寫的東北通志。書中凡例首條中即指出：

奉旨修纂志書，部頒以《河南通志》為例。謹按盛京為發祥重地，非他省可比，今兼採明《一統志》南京、中都、興都之例，體有特尊也。其先後增減分合，詳略亦各有異同，務期得當，不敢苟也。²⁸

引文所稱《河南通志》，為清初順治年間河南巡撫賈復漢所編纂，志中首先以建置沿革為首卷，但由於清代盛京的特殊地位，若依循禮部頒示以該志體例為準，則與一般省區無所分別，乃援引《大明一統志》陪都南京體例等，以京城為首，其次壇廟、山陵、苑囿、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城池、關梁、公署、職官、學校、選舉、戶口、田賦、風俗、祠祀、物產、古蹟、帝王、名宦、人物、孝義、列女、隱逸、流寓、方伎、仙釋、藝文。其中明《一統志》無而新增者計有宮殿，置於山陵之後；邊門與船艦，附於關梁志內；驛站，他志皆不載，特立一志，並附舖遞。上述共計三十二卷，一卷一門。

由於本書為清初開國以來的首部通志，為昭示一代盛事，編輯官員極盡心力，窮蒐廣徵，除翻檢清代有關典籍外，並調取內務府舊檔文獻，並採康熙二十二年前已刊行的錦州、遼陽、廣寧、海城等地州縣志資料。而繪製地圖方面，更會同奉天將軍、寧古塔、烏拉等處官員，深入大山窮谷之中，繪製輿圖。據王一元在其《遼左見聞錄》一書中憶述：

各州縣官扶畫工而行，分詣邊外深山窮谷中，閱歷殆遍，逾年志成。²⁹

在撰寫過程中，當時因罪謫戍盛京的陳夢雷（1650-1741），以其材識受知於奉天府府尹高爾位。後高氏去職，董秉忠接任，陳夢雷仍繼續參與《盛京通志》的編纂工作，並為各卷次撰寫小序。³⁰ 康熙初年《盛京通志》得以順利成書，陳夢雷堪稱居

28 (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凡例〉。

29 轉引自劉曉玲，〈清康熙朝東北方志文獻研究〉，頁20。

30 陳夢雷在康熙二十三年刊本所撰寫的各卷小序內容，均完整收錄於陳氏所著《松鶴山房文集》卷九之中。(清)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收入《續收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416，頁82-92)，集部，別集類。

功厥偉。誠如他在〈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中提到當時編寫此書時的艱苦情況：

自是三韓以北，故都舊邑，斷碣遺碑，靡不搜剔。而內地編戶所隸，二三有司，亦咸悉心諮諏耆舊，摭摭異聞。逾年而規模略定。³¹

（二）康熙五十年《盛京通志》

就體例而言，康熙五十年的《盛京通志》基本是沿襲舊志基礎增補而來，其凡例與卷次也完全與前志相同。因此以往許多學者皆以此書為康熙二十三年的重刊本。但仔細比對內容，不僅在輿圖中增加了〈錦州府形勢圖〉，職官志上增補了康熙二十三年以後的歷任官員，而卷三十二〈藝文志〉中增補尤多，除康熙帝御製典詔數篇外，更補入康熙二十一（1682）與三十七年（1698）第二、三兩次東巡盛京時寫下的御製詩計七十餘首。此外，書中〈藝文志〉並特地將郝浴在奉天戍所期間寫下的雜記、書信與詩賦計十餘篇添入。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從中突顯出修志官員藉此表彰郝浴對盛京一地的貢獻。

郝浴（1623-1683），字冰滌，又字雪海，後更號復陽，直隸定州人。順治六年（1649）進士，四川巡撫任內因舉發平西王吳三桂跋扈不法而遭構陷，險至不測，後免死謫放盛京。流戍期間，結冰天詩社，與當地文士交流，又在鐵嶺招生講學，創建銀岡書院。康熙十年（1670）康熙帝東巡盛京，先後兩次謁見，具陳遭遇。及吳三桂反，京中大臣如尚書王熙、刑科給事中劉沛、順天府尹魏象樞等人先後具疏題請豁赦郝浴，終於在康熙十四年（1674）得以奉詔還京，臨行時將其房產土地、圖書器物悉數捐予地方官員，作為書院辦學之資。然而後來由於校址遷移，書院原地荒廢，竟被八旗兵丁侵占。康熙四十九年（1710），經郝浴仲子郝林、生員徐元弼，以及鐵嶺知縣焦獻猷的奔走下，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才得以收回土地並重建書院。³² 康熙五十年《盛京通志》修纂期間，正是郝林等人為收回書院土地努力交涉之際。當時參與修補通志的焦獻猷，將郝浴謫戍留下的詩文收錄志中，不僅用以表彰郝浴對遼地文化教育貢獻，更希望不致因書院廢棄而遭湮沒。

31（清）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卷9，〈代高京兆盛京通志序〉，頁82。

32 有關郝浴父子與銀岡書院興衰，相關論著可參謝景芳、趙洪剛，〈郝浴父子與奉天鐵嶺銀岡書院〉，《明清興替史事論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頁297-307；馬可寧，〈銀岡書院的創始與發展〉，《北方文物》，1999年3期，頁91-94。

（三）乾隆元年的《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成書的《盛京通志》，共三十四門，計四十八卷，圖十四幅，在內容與輿圖數量上較康熙朝《盛京通志》皆明顯增多。本書除沿襲舊志既定序例如〈京城志〉、〈壇廟志〉、〈山陵志〉等未作更動外，但在其他部分則另有調整增補之處。首先，將舊志〈藝文志〉內皇帝的御製詩文，改採雍正九年（1731）郝玉麟監修的《廣東通志》體例，另行編出〈典謨志〉，並置於首卷；此外，於卷尾增補〈雜誌〉一卷，置於〈藝文志〉後，以資讀史者博取考證。至於卷三十至四十一各卷有關名宦、人物、孝義、隱逸、流寓、方伎與仙釋等項，前志中本朝部份未載者，本志中則參考地方書傳、訪問故老耆舊等方式予以增補。另本書最大特色，是開始注意到八旗方面文史資料的補充。如考正滿族人名、地名同音異譯的書寫問題，卷二十一《學校志》內增入「八旗官學義學」，卷二十二中〈選舉志〉補入「八旗科貢」，另卷二十〈職官志〉也添載盛京各地駐防八旗，此皆舊志所無，開始突顯出《盛京通志》內加入滿族原素的一個面向。

至於本書較舊志增補輿圖五幅，計有〈奉天將軍所屬形勢圖〉、〈寧古塔將軍所屬形勢圖〉、〈黑龍江將軍所屬形勢圖〉、〈北鎮廟圖〉、〈千山圖〉，惟書中凡例所稱增入之〈旅順海防圖〉卻未見於刊本內。

（四）乾隆十三年《欽定盛京通志》

全志三十二卷，卷次較前志減少，但門類卻較增加。對此，本志凡例中有所解釋：

前志為卷四十有八。考《遼東志》初於明畢恭者九卷，李輔重修者十二卷。前志大抵因之，而亦以近事，稍加擴充。然為卷太多，則失之冗；復按明柳瑛《中都志》僅十卷，沈應文《順天府志》僅六卷，即《興都志》徐階奉敕所修者亦止二十四卷，《承天大志》部帙稱多，然亦不過四十卷。蓋成一書，欲其傳信而垂後，則必簡嚴精核，卷帙自不在多。今難繁約要，凡三十有二卷云。³³

「為卷太多，則失之冗」、「欲其傳信而垂後，則必簡嚴精核」，從中即可看出，本書編輯者對前志冗長的不滿。然而，若從內容來看，則志中卷數雖求精簡，但實際上是將前志原有卷數合為一卷，例如前志中卷五〈京城志〉、卷六〈壇廟志〉、卷七

33（清）汪由敦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本），〈凡例〉。

〈山陵志〉與卷八〈山陵志〉共四卷，本志纂修時認為舊志「篇少而卷煩」，遂合四卷為一卷；又如前志卷十〈建置沿革志〉、卷十一〈星野志〉與卷十二〈疆域志〉三卷，重修本也合為一卷，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卷次也同樣出現，茲不贅述。但如此的編排考量雖使新志卷次減少，達到編纂者講求「簡嚴精賅」的目的，但卻使卷序零亂，翻檢不便；又例如卷二十六中將風俗、物產、雜誌各自不同門類使之併為一卷，互不相統，為求簡約卻有弄巧成拙之感；相對地，將前志〈典謨志〉析為歷朝五帝〈聖製〉與乾隆所撰為〈御製〉兩門，內容對詔敕碑頌記文詩等各體也漫無區別，又是流於架床疊屋之失。但不能否認，此志體例架構上雖存在不少問題，惟其取裁內容以及校核考證之處，又遠較前志益加精詳豐富，其輿圖繪製之精美，不僅突顯皇家出版品之氣派；而對皇清開國八旗佐命功臣，詳參《八旗通志》與《功臣傳》所載徵輯入志，細緻描述其忠誠英勇，縱橫沙場功蹟，藉由歷史書寫從而激勵後代八旗子孫關外時期祖宗們的尚武精神。總之，本志編纂者雖謂「因前志刪煩訂訛」，在訂訛上堪稱完善，其刪煩之處則缺失不少。後來重修本志即評此書「體例亦多未合」，因由即在於此。

（五）乾隆四十九年《欽定盛京通志》

乾隆四十九年刊行的《欽定盛京通志》，一百三十卷的洋洋鉅典，附圖三十五幅，其篇幅數量與載錄內容，以往四部《盛京通志》無疑望塵莫及。本書由阿桂領銜編纂，其身為滿洲八旗子弟，對關外盛京山川人物的緬懷嚮往，自較以往編纂通志的歷任官員有不同感受與體會。全書體例基本上據汪由敦所編前志卷序擴增而成，但修正前志將數門合併為一卷的缺失，重新逐一析出，各自獨立成一卷或數卷。如前志將乾隆元年《盛京通志》之〈典謨志〉分為〈聖製〉與〈御製〉，但內容淆雜，體統混亂，此書吸收前志缺失，以清初諸帝聖訓、聖諭、詔敕、詩文統入七卷之〈聖製〉，當朝論旨、詔敕列入〈綸音〉，而詩、賦、文各體則歸屬〈天章〉，體統有序。其次，本書大量參考清廷已有之文獻檔案，諸如歷朝實錄、聖訓、御製詩文、會典、國史傳記資料，《欽定遼金元史》、《八旗通志》、《滿洲源流考》等官方出版物，內容豐富。³⁴

然而，本書更大的特色是其主題鮮明，主軸清晰。全書雖依循前志卷序編寫，但內容卻是圍繞著乾隆八年（1743）、十九年（1754）、四十三年（1778）以及四十八年（1783）四次東巡盛京活動為主線鋪陳開展。乾隆年間至盛京謁祭祖陵、

34（清）阿桂等編纂，《欽定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凡例〉。

祭奠功臣、周覽山川、巡視邊防、圍獵閱兵、賞賜蠲稅、題詞賦詩、修葺宮牆、以及將大量典冊與御用珍玩名畫移貯陪都等盛舉，³⁵ 逐次融入各卷描述之中。而將皇祖康熙三次東巡與皇父雍正親王時時代父謁祭祖陵的各種活動紀錄，則分別置於書前數卷〈聖製〉，以為全書的伏線，最後以〈國朝藝文〉計十六卷的長篇內容，大量收錄圍繞著朝廷大臣與乾隆帝和詩的藝文作品為結尾。全書主次分明，內容詳盡豐富，不僅是清初以來官方撰寫東北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探討乾隆四次東巡的重要文獻。此書授命編纂的阿桂，無獨有偶，當他秉承王命完成此部足以稱為乾隆「東巡盛典」的作品後，同年又編成乾隆在位六次南巡的《欽定南巡盛典》。此書編纂發端於乾隆四十三年，而之所以遲至六年後始行問世，不能不說與乾隆結束最後一次東巡有密切關係。

綜觀清初康、雍、乾三帝在位年間，耗時百年，共編成五部《盛京通志》，從最初刊行起算，時間適自十七世紀八〇年代至十八世紀八〇年代。這部基本上由官方主導編纂的出版品，假如從整體性作一觀察的話，有兩方面值得在此進一步說明。首先，從編纂群來看，康熙二十三年、五十年以及乾隆元年三部《盛京通志》，編纂群基本上是盛京地方官員組成，上自將軍、府尹、府丞，下至知府，知州、知縣，治中、通判、學正、教授、典史、經歷等官，基本上仍是以盛京地方官員為主要成員。然而，明顯轉變的是，到了乾隆十三年與四十九年所編的通志，除了十三年刊本編纂群不詳，其中惟一可以確定是時任刑部尚書汪由敦主持外，而四十九年問世的通志，從職名清單上所具列的官職包括大學士、內務府大臣、侍郎、給事中、員外郎、侍讀以及中書等成員，卻未看到任何一位屬於盛京地方官員的參與。從編纂群由地方轉向中央的變化，當然一方面顯示乾隆年間朝廷中樞文獻典藏的豐富，足以提供朝廷官員進行地方志的撰修，但更重要是意味著乾隆皇帝對盛京地方歷史書寫由中央主導的態度；其次，從通志書名的變化來看將更印證上述的轉變，康熙年間與乾隆元年問世的通志，是以《盛京通志》為名，但乾隆十三年與四十九年刊本，則取名為《欽定盛京通志》，「欽定」兩字，清楚地表達出由皇帝敕命撰修，主導編寫的意味。然而筆者不禁要問，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地方志的撰寫，是地方官員之責，所謂「掌故副在職方」，由於地方官因地利之便，更能即

35 有關乾隆皇帝四次東巡前後從北京往盛京移送典籍文物的討論，參見丁海斌、時義，《清代陪都盛京研究》，第七章，〈清朝陪都盛京的文化〉，頁 215-227；另趙秉忠，〈論清帝東巡〉，《社會科學輯刊》，1994 年 5 期，頁 121-127 與楊小梅，〈清帝東巡及對瀋陽文化的影響〉，《蘭臺縱橫》，2105 年 5 期，頁 72-73 等文，均有相關討論。

時掌握與了解地方歷史與事件的變化。而當撰寫角色轉向中央廟堂，究竟朝廷官員對地方歷史有多大的了解，其所描述的地方歷史與事實的地方事務究竟出現多少差距？乾隆年間出版的盛京通志，其內容隨著時間累積自較前志更為豐富，但所書寫的究竟是十八世紀盛京的真實內容？對此筆者持保留態度，而乾隆皇帝為了彰顯關外滿洲發祥之地，國朝龍興之處，為了重振八旗精神，對盛京歷史的書寫力求美化，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盛京一地，注入更多個人情感，是否已陷入主觀地建構盛京地方史的現象，看來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百年變遷：五部《盛京通志》所反映十七、八世紀東北的政經變化

盛京歷史的發展，見證了滿族從一個臣屬於明朝的部落政權，逐漸茁壯，進而擴大成一個統治東北地區，並最終得以成為君臨天下的大清王朝。對滿族統治者而言，即使定鼎中原，遷都北京，關外盛京仍是他們的發祥之地，龍興之處，因此定盛京為陪都，使其規制與北京匹配，從而突顯盛京地位的特殊與尊崇。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當一六四四年滿族將士攜家帶眷大舉從龍入關，盛京的景象隨即因原有人口大量外移以致出現土地拋荒、產業蕭條的頹象，這與朝廷聲稱尊崇盛京的主張可說背道而馳。事實上，順治年間對此確也曾作出努力，其中值得注意的政策是順治十年實施「遼東招民開墾例」，試圖透過配地與授官手段，刺激關內人民出關開墾，藉以重振當地經濟生產。其具體內容康熙二十三年與五十年兩部《盛京通志》雖未紀載，惟乾隆元年以後各個版本之〈戶口〉卷次中均有相同記述：

（順治十年）是年定例，遼東招民開墾，至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上，文授縣丞、主簿，武授百總，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所招民每名給月糧一斗，每地一畝，給種六升，每百名給牛二十隻（康熙七年例停）。³⁶

36 內容分別見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23〈戶口〉、乾隆十三年《欽定盛京通志》卷11以及乾隆四十九年《欽定盛京通志》卷35〈戶口〉。

至於此招墾令推行成效究竟如何？歷來研究學者雖評價不一，³⁷ 但據時人觀察應該更能接近實際情況。例如順治十四年（1657）吏科左給事中王益朋在〈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敕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中指出：

我朝定鼎燕京，則遼陽發祥之地，實猶昔之南京也。……幸皇上親政（順治八年），加意根本，懸爵招民，權宜鼓舞。究竟所招不多，生聚無幾，開墾未廣。……頃見遼陽府知府張尚賢招徠不繼一疏，有云去歲自春徂秋，招頭絕跡。³⁸

從王益朋的描述可見，政策推行後的第四年遼東招民開墾情況確實不如預期。至四年後的順治十八年（1661）五月間，當時康熙帝即位之初，奉天府府尹張尚賢又針對遼東仍屬荒土漫煙情況有如下的陳述：

盛京形勢自興京至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合河東、河西之邊海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有府縣之規，……鐵嶺、撫順，唯有流徙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河西城堡更多，人民希少，獨寧遠、錦州、廣寧人民湊集。……合河東河西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頽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³⁹

奏疏中張尚賢分別從遼東邊海與腹裡兩個不同區域經濟狀況，整體上了解到十七世紀上半葉滿族入關後將近二十年遼東整體開墾仍是「黃沙滿目、一望荒涼」的景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疏中描述遼河以東奉天府所屬的遼陽、海城二縣「有府縣

37 有關順治十年實施的「遼東招民開墾例」政策，其成效方面的討論以往學者對此評價不一。如賀飛據當時記載資料認為效果並不顯著，而管東貴與李國亮兩人從當時開墾土地數量持續增長而認為「有一定成效，絕非成績不良」，而刁書仁更主張開墾令起到積極作用，對清代東北地區農業開發起了決定性意義。上引諸篇，分別參見賀飛，〈清初「遼東招民開墾例」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7；管東貴，〈清初遼東招墾授官例的效果及其被廢原因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4本2分（1972），頁235-240；李國亮，〈清初「遼東招民墾田授官例」研究〉，甘肅：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頁71；刁書仁，〈清初遼東招民開墾令與遼東地區的農業開發〉，《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4期，19卷，頁51。

38 王益朋，〈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敕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收入仁和琴川居士編，《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10，頁34a-39a。

39 張尚賢的〈敬陳奉天邊地情形疏〉，其他《盛京通志》版本未收，僅見於（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卷129，〈國朝藝文十五·疏〉，頁1a-2b。通志中張尚賢此疏繫於順治丁亥（四）年，與（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2，頁64-65記載為順治十八年五月初九日時間不同。惟從內容來看，似應以《清聖祖實錄》所記為是。

之規」，而遼河以西仍由地方佐領管轄的寧遠、錦州、廣寧等地，也出現「人民湊集」的景象，可見就局部範圍而言，招墾政策仍在若干程度上發揮效果，尤其屬於行政區域的州縣地方，仍然有經濟復甦的現象，惟僅屬於零星的個別情況。編纂於康熙二十三年的《盛京通志》，如前所述它是一部最早由官方刊行的盛京地方志書，內容中曾描述早年關外地方情況：「州縣新設，戶無舊籍，丁鮮原額。」⁴⁰

然而，隨著康熙二十年代初平定的臺灣，沿海禁令解除後，猶如打開潘朵拉魔法盒所造成的後果一樣，移民浪潮卻有遏止不住的勢態，至康熙末年，漢人往關外擴散漫延情況更為顯著，幾遍及整個遼東區域，並由此引起滿族統治者心理上的焦慮。筆者在此即依據《盛京通志》各部所載清初至乾隆年間移民人丁數量與奉錦兩府所屬民地、旗地變化情況整理如表二，藉以了解清初百年間盛京移民與土地變化情況。

表二 清初移民人丁數量及奉錦兩府所屬民地旗地變化表

	西元 年份	丁數	奉錦兩府所屬 州縣民地畝數	奉錦兩府所屬 旗地畝數	資料來源
順治初年				442,097 畝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8, 〈田賦〉, 頁 16b。
順治十八年	1661	5,557	60,933 畝	2,652,582 畝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7, 〈戶口〉, 頁 3a;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4, 〈田賦〉, 頁 2b; 卷 24, 〈旗地〉, 頁 21a。
康熙七年	1668	16,643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7, 〈戶口〉, 頁 3b。
康熙十二年	1673	25,723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7, 〈戶口〉, 頁 5a。
康熙十五年	1676	26,713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7, 〈戶口〉, 頁 6a。
康熙二十年	1681	28,724		2,492,046 畝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7, 〈戶口〉, 頁 7a。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312,859 畝		《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8, 〈田賦〉, 頁 7a。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26,227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3, 〈戶口〉, 頁 8a。

40 (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卷 17, 〈戶口〉。

	西元 年份	丁數	奉錦兩府所屬 州縣民地畝數	奉錦兩府所屬 旗地畝數	資料來源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7,005,269 畝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4,〈旗地〉,頁 23a-b。
康熙五十年	1711	42,210			《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 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卷 35,〈戶口一〉,頁 4a、12b- 13a。
雍正二年	1724		580,638 畝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4,〈田賦〉,頁 8a。
雍正五年	1727			8,206,828 畝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4,〈旗地〉,頁 24a-b。
雍正十一年	1733	47,124	2,474,911 畝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3,〈戶口〉,頁 9a;卷 24,〈田 賦〉,頁 8b-13b。
雍正十二年	1734	47,476	2,595,368 畝	16,006,812 畝	《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 卷 23,〈戶口〉,頁 12a-14b; 卷 24,〈田賦〉,頁 14a-17b; 卷 24,〈旗地〉,頁 25a。
雍正十三年	1735		2,624,657 畝		《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 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卷 37,〈田賦一〉,頁 5a、25a- b。
乾隆六年	1741	53,514			《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 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卷 35,〈戶口一〉,頁 4b、 13a。
乾隆十六年	1751	65,254			同上,頁 4b、13b。
乾隆二十六年	1761	81,771			同上,頁 4b-5a、13b。
乾隆三十六年	1771	82,323			同上,頁 5a、13b。
乾隆四十五年	1780			13,714,299 畝	《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文 淵閣四庫全書寫本),卷 37,〈田 賦二〉,頁 15b-18a。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82,803	3,570,210 畝		《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 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卷 35,〈戶口一〉,頁 5a、 14a;卷 37,〈田賦一〉,頁 5a-6a、25b-26b。

雖然方志中所載丁數與田地畝數可能與實際情況存在相當差距，但假如透過直觀式的觀察，大致上仍然可以了解當時變化的大致趨勢。就人丁變化方面來看，

順治末年至康熙中期，漢人移民關外後編入丁冊的人丁數量，從 5,557 丁成長至 26,227 丁，增長約 5 倍左右，而從康熙中期以後至雍正年間，人丁增長數量則是順治末年的 8 至 9 倍有餘，到乾隆年間，更增長 10 至 16 倍有多。表中漢人丁數的增加，僅是官方記錄上入籍登記後的數字，假如把隱匿於旗地之內，替滿族耕種的人口列入考慮，其數量將遠超過表中數字。

其次，從田畝變化數量來觀察，自清初以來，雖然關外旗地數量一直遠多於漢人開墾的民地，但兩者間比率，卻呈現隨著時間而有逐漸拉近的趨勢。如順治末年旗地畝數為民地之 43 倍，但至康熙二十年代初期，旗地數為民地的 7.9 倍，而雍正末期，旗地與民地間比率又縮至 6.1 倍，到乾隆晚期，旗地僅為民地之 3.8 倍。再就兩者成長速度觀之，若以順治末年為基期，康熙中期民地數量增長 5 倍，雍正初年增長 9.5 倍，至雍正末年為 43 倍，到乾隆末年擴張至 58.6 倍。相對地，旗地在順治年間增加 6 倍，至康熙中葉擴張 15.8 倍，至雍正初年成長 18.6 倍，乾隆末年為 31 倍。總結兩者數量間比率與個別增長趨勢變化，兩者間的比率不僅逐步拉近，而民地擴張情況更遠超過旗地成長的速度。假如再考慮到漢族移入關外以後，除了自墾或民典旗地，將土地逐漸成為漢人私有外，更多的情況是基於利益考量，或帶地投充，或佃租旗地，甚至轉換身份由民入旗的方式直接拓墾旗界土地，種種現象皆顯示出十七、八世紀百年間盛京土地制度變化與漢族移民活動的密切關係。⁴¹

隨著漢人移墾腳步的擴張，改變了清朝入關之初遼東地區荒涼蕭瑟景象，荒土化為沃壤，孤村漸成郡邑。漢人大量的拓墾，固然帶來東北經濟的復甦與政府稅收的增加，但由於滿漢民族接觸頻繁，卻引發治安與糾紛的社會問題。東北作為清朝龍興之地，維護地方旗人權益向來是王朝的基本立場。當漢人移墾日多，旗漢之間的管理成為統治者首要面對的課題。

遼東地區原屬於八旗將士所屬的土地，滿族入關之初，此一廣大土地委由盛京總管管轄，統轄滿洲、蒙古、漢軍八旗駐防事宜。⁴² 順治三年，改盛京總管為盛京昂邦章京，鎮守東北全境，實際目的是為了保護關外皇陵、宮殿、皇室莊園與八旗官地。⁴³ 康熙元年，改盛京昂邦章京為鎮守遼東等處將軍，四年，改稱鎮守奉天等

41 有關清初盛京旗地與民地之間土地制度變化與漢族移民活動關係，丁海斌、時義，《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一書有較詳細的論述，見該書，頁 148-165。

42 (清)戴衢亨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 179，〈兵考一〉，頁 12b。

43 趙秉忠，〈清朝前期對東北地區的管轄〉，《歷史教學》，1981 年 6 期，頁 57-59。

處將軍。至乾隆十二年，又改稱為鎮守盛京等處將軍，簡稱「盛京將軍」，為當地最高軍政長官。然而，以盛京將軍為主的八旗管理系統外，隨著漢族移民日多，為了加強漢人的管理、徵稅與理訟，設置州縣，建立處理漢人事務的民署機關成為必然的結果。

表三 清初東北地區州縣沿革表

年代	西元紀年	州縣沿革	州縣數量	備註
順治十年	1653	初設遼陽府，置遼陽、海城二縣。	一府二縣	時錦州、寧遠、廣寧、沙後四城仍屬佐領所轄
順治十四年	1657	裁遼陽府，改名奉天府，置府尹。	一府二縣	
康熙三年	1664	設廣寧府，錦州改置錦縣，又置廣寧縣、寧遠州。奉天府添設承德、蓋平、開原、鐵嶺四縣。	二府一州八縣	
康熙四年	1665	裁廣寧府，設錦州府。改遼陽縣為遼陽州。	二府二州七縣	
雍正五年	1727	吉林寧古塔地方增設永吉州、泰寧縣、長寧縣；復州置廳，設通判。	二府三州一廳九縣	
雍正七年	1729	裁泰寧縣。	二府三州一廳八縣	
雍正十二年	1734	復州設知州，改金州巡檢司為寧海縣，又設義州知州。	二府五州九縣	
乾隆元年	1736	裁長寧縣，併入永吉州。	二府五州八縣	
乾隆十二年	1747	裁永吉州，改設吉林廳。	二府四州八縣	吉林廳歸寧古塔將軍管轄

資料來源：（清）汪由敦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本），卷6，〈建置沿革表〉，頁15a-25b。

當順治十年清廷推行「遼東招民開墾例」後，因應漢人移入始設府州縣等民署機關。順治十四年，改遼陽府為奉天府，設府尹，⁴⁴為奉天地區最高民政長官（有關清初東北地區百年間行政區域沿革變化整理如表三）。學者即指出，自此東北關外正式由原來以盛京將軍為主的「單一八旗管理體制」，轉變為「旗民雙重行政體

44 遼陽府改名奉天府，為順治十四年吏科給事中王益朋之議，見前引王益朋，〈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敕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頁34a-39a。

制」。⁴⁵ 盛京將軍雖然地位尊崇，但隨著漢人大量湧入，這些移民卻為府尹的權責管理範圍，遂形成軍政與民政間互不統屬，相互牽制的矛盾局面。如《皇朝文獻通考》所言：「凡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事務，則統之于奉天將軍；凡民人事務，則統之于奉天府尹。」⁴⁶ 扼要地描述當時盛京地方軍政與民政兩權對立的情況。當涉及旗人與民人間利益衝突與法律糾紛之際，必須會同旗員審理，而八旗與州縣官員又因立場相左以至意見參差，往往延誤案件審理。對此，康熙年間即有官員建議將盛京知縣官員改派滿洲旗人擔任，但因礙於人事選用上無成例可循，最後被吏部否決。⁴⁷

然而，當旗民的糾紛日漸頻繁，官員間的對立矛盾也隨之日益顯露。例如雍正六年（1728）發生寧遠州知州郭承珣因徵收莊糧與旗兵莊頭發生衝突一事，時任奉天府府尹王朝恩即私下具摺向雍正帝透露內心的無奈，摺中指出：

盛京地方民官處處，與旗兵莊頭雜處。……臣在盛京辦事年餘，深知地方調劑之難也。……寧遠州牧郭承珣與莊頭角口，雖係鹵莽，失之太過。但收受莊糧，亦非易事，若因此遽列彈章，恐後來州牧更覺難於收糧。臣之愚見，地方辦事之官，與其柔而無能，不如剛而有用。⁴⁸

在王朝恩的奏摺後，雍正帝只簡短寫下「是，知道了」的硃批，究竟此案後續的處理如何？由於資料有限雖無法得知，但從郭承珣擔任知州至雍正十年（1732）始行離任情況來看，雍正帝對此事似乎接受了王朝恩的建議，並未對郭承珣又進一步的懲處。但王朝恩摺中認為盛京州縣官員遇事應剛正不阿的主張，在現實情況朝廷對盛京首崇滿洲的原則下，地方漢族官員經常遭遇壓抑，柔順與剛強，不過是事件發生之際當事人的處置對策，而就客觀情勢而言，當漢族移民大舉進入關外墾殖擴張，進而影響到當地滿洲八旗的權益，衝突事件往往層出不窮。

45 參田志和，〈論清代東北行政體制的改革〉，《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4期，頁59；孟繁勇，〈清代盛京將軍與陪都機構權力關係的演變〉，《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3期，頁128-135。

46（清）戴衢亨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271，〈輿地考二〉，頁10b。

47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左都御史達都奏請：「盛京知縣以上官員應用滿洲。吏部議不准行。」上問曰：「爾等云何？」大學士明珠奏曰：「盛京地方滿漢並處，似應設滿官。但知縣以上各官並無選用滿洲之例，總唯聖裁。」上命從部議。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冊2，頁852。

48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盛京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王朝恩奏摺，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文獻編號：402015707，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土地的糾紛、經濟利益的衝突、民族間認同的矛盾，在在成為盛京地區漢人移入後引發社會秩序與地方不安的問題。朝廷總希望要求地方官員能以持正態度來處理旗漢交涉事件，但另一面卻在崇滿國策，維護關外滿族權益，保障八旗生計為優先立場的情況下，漢族官員處理地方事務必須面對朝廷雙重標準而處處被受制肘。雍正十一年（1721），當內務府要求錦州府將原屬八旗圈地交出改歸旗人耕種，時奉天府府尹呂耀曾遂為民請命，卻被雍正帝視為偏袒漢民受到申飭便是最佳例證。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即是呂耀曾主持編纂。在交還圈地事件中，呂耀曾具奏指出內務府建議的失當，摺中認為：

查寧遠州，錦縣、廣寧縣，戶口繁多。向來民地原少。自雍正三年將退圈地畝交與民官，招民耕種，錦屬人民始皆樂有恆產。築廬舍，安墳塋，鑿井而飲，更田而食。八載以來，獲享盈寧之樂。今一旦撤回，並無安插之法，事係地方要務。……伏懇皇上察念輿情，將退圈之地免其撤回，仍令照舊耕種輸糧。其添設莊頭之處，請敕下內務府另行議奏。⁴⁹

然而，呂耀曾摺請並未被雍正帝認同，硃批寫道：「此奏甚覺孟浪，若作市恩之舉，稍露風聞，非爾之福，慎密為要。」

研究指出，十八世紀滿族內部面對著日漸提升的認同危機，此一危機主要包含八旗漢化造成對滿族尚武文化的威脅，其次是八旗人口膨漲構成王朝經濟的負擔。此一現象雍正時期日益明顯，至乾隆即位後致力如何強化滿族認同、維護滿族特權，保障八旗生計，成為滿族統治者重要任務。⁵⁰ 事實上，乾隆帝也明確說道：「盛京滿洲，皆朕臣僕」。⁵¹ 盛京為八旗起源之地，統治者自然無法坐視漢人經濟發展以致威脅滿族的權益，開始逐步收緊漢人在當地的擴張，移民封禁政策轉趨嚴厲，甚至地方官員也改變以滿人取代漢人的方針。

上述的轉變在乾隆五年（1740）乾隆皇帝向兵部左侍郎舒赫德的一次面諭為始，正式打開了乾隆帝重振東北滿族權益的序幕。諭旨內容提到：

49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奉天府府尹呂耀曾奏摺，雍正十一年九月初十日，文獻編號：40201670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0 歐立德（Mark C. Elliott）撰；溫清梅譯，〈清八旗的種族性〉，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9-125。

51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寫本），卷 9，〈諭內閣〉，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頁 6a。

盛京為滿洲根本之地，所關甚重。今彼處聚集民人甚多，悉將地畝佔種，盛京地方糧米充足，並非專恃民人耕種而食也。與其徒令伊等佔種，孰若令旗人耕種乎？即旗人不行耕種，將地畝空閒，以備操兵圍獵，亦無不可。爾至彼處，與額爾圖詳議具奏。⁵²

據舒赫德抵盛京將諭旨與盛京將軍額爾圖商議後覆奏：

奉天地方為滿洲根本，所關實屬緊要，理合肅清，不容群黎雜處，使地方利益悉歸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已立有產業，未便悉行驅逐。須緩為辦理，宜嚴者嚴之，宜禁者禁之。數年之後，集聚之人漸少，滿洲各得本業，始能復歸舊習。今若明降諭旨。無知小民，恐將伊等悉行驅逐，難免不生他故。⁵³

在回奏中，舒赫德具體地規劃出限制漢人移民出關各款，內容包括：嚴禁漢人攜眷出關、嚴厲限制前往奉天商船人數、嚴格保甲稽查、奉天空閒田地專令旗人墾種、取締私自鑿山開採硫磺煤礦、嚴懲偷挖人參、整飭宗室覺羅風俗、加強出關旗人口票稽核等共八條。⁵⁴ 上開各項經王大臣討論，乾隆皇帝同意後正式執行，其具體反映出乾隆初年清廷在強化東北封禁政策，保障旗人生計採用國家力量的介入態勢。⁵⁵ 回想清入關之初，為振興關外農業經濟，朝廷積極鼓勵漢人移民墾殖。百年以來，出關漢人胼手胝足，為東北地方經濟貢獻心力。然而，時移勢易，百年之間，在維護滿族八旗的原則下，從最初鼓勵漢族移墾，轉向嚴厲管控漢人發展的方針。

乾隆時期對盛京的管理政策不僅在收緊漢人經濟發展的限制，其干預手段也隨著封禁政策延及盛京地方州縣官員任用上。為進一步保障旗人的任官機會，乾隆十五年（1750）奉天府府尹蘇昌首度建議將轄下十二州縣官員悉改由旗人充任。此議奉諭旨轉交軍機大臣討論。經軍機大臣回覆：

52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687-688)，卷115，乾隆五年四月甲午條。

53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高宗實錄》，卷115，頁688。

54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高宗實錄》，卷115，頁688-690。

55 有關乾隆初年清廷的東北封禁政策，可參見張杰，〈試論清前期的東北封禁〉，《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5期，頁118-120；刁書仁，〈論乾隆朝清廷對東北的封禁政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6期，頁83-90。

奉天十二州縣，向用漢員，其旗民交涉詞訟，俱會各城旗員審理。往注意見參差，若竟以旗員選此十二州縣，遇事不必會同辦理，較為畫一。但一時更調，未免紛紜。請嗣後於此十二州縣內遇出缺，即令該部將候選旗員銓補。則數年後，該省州縣俱屬旗人，於旗民交涉事件，竟可專歸州縣審結，徑報該處將軍查核。⁵⁶

蘇昌（?-1768），滿洲正藍旗人，他的人事建議在朝廷首崇滿洲政策下自然深得帝心，自府尹至州縣官員悉以旗人出任，經軍機大臣奏請後隨之下旨允行。相對於康熙年間官員曾以相同建議將盛京州縣改派旗人出任，最後因礙於成例而未果，乾隆時期卻在重振八旗、維護滿洲利益的呼聲下，盛京地方漢人開始逐漸被排出地方行政舞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二月間，為了提升盛京將軍的管轄權力，進一步調整奉天府府尹與盛京將軍間的統屬關係。諭旨中指出：

盛京向例將軍管轄旗人，奉天府府尹管理民人。原無統轄。嗣因盛京係滿洲根本之地，所有州縣官員皆已定為滿缺。……此皆因將軍、府尹不相關涉，各分畛域之所致。是以各屬員等亦存旗民分管意見，並不和衷辦理，於地方事務甚無裨益，不可不為變通。在府尹為全省大吏，雖不便為將軍屬員，亦當令其聽將軍節制，庶旗民事務歸一。一切辦理不致參差。嗣後奉天府府尹著聽將軍節制，遇有應行差拏人犯，該地方州縣官即同將軍差委之人協力查拏。⁵⁷

從盛京地方官員選用滿洲旗人，進一步擴大至府尹受盛京將軍節制，乾隆帝在貫徹「滿洲本位」理念上，較之以往都來得強烈。⁵⁸

本文嘗試利用各部《盛京通志》中〈職官〉卷次所記，整理順治至乾隆年間盛京二府十二州縣官員籍屬出身如文後〈附表一〉。茲據附表一所列各府州縣官員任職年份及籍屬分佈統計見表四，如下：

56（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高宗實錄》，卷356，乾隆十五年正月乙卯條，頁917。

57 諭旨內容轉引自《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盛京將軍社圖肯奏摺，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文獻編號：40301408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58 有關奉天地方官員的選任問題，參見徐雪梅，〈淺析清朝奉天文官選任的民族選擇性〉，《北方文物》，2011年3期，頁81-83；又徐雪梅，〈淺議清朝奉天府尹的選任〉，《東北史論》，2012年3期，頁57-59。雖然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願及奉天府府尹受盛京將軍節制後公務多受牽掣，下令照順天府府尹成例，派盛京五部侍郎兼管，但從數量上與籍屬上，也均是滿洲八旗為主。見（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9，〈諭內閣〉，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七日，頁3a-b。

表四 各府州縣官員任職年份及籍屬分佈統計

	遼東出身	外省籍屬	漢軍八旗	滿洲八旗	蒙古八旗
順治年間	2	1	1	0	0
康熙元~二十年	14	35	5	0	0
康熙二十一~四十年	4	23	15	0	0
康熙四十一~六十一	0	37	12	0	0
雍正年間	0	40	9	3	0
乾隆元~十年	0	30	3	0	0
乾隆十一~二十年	0	17	1	16	1
乾隆二十一~三十年	0	0	0	22	2
乾隆三十一~四十年	0	0	0	40	3
乾隆四十一~四十九	0	9	0	23	7
共計 375 名	20	192	46	104	13
	5.3%	51.2%	12.3%	27.7%	3.5%

文後〈附表一〉及表四顯示，順治至乾隆年間奉天、錦州兩府十二州縣地方，其官員籍屬基本上可分為遼東地區出身漢族官員、外省選任漢族官員、漢軍八旗、滿族八旗以及蒙古八旗等五種。遼東地區出身的漢族官員，主要出現在順治至康熙中葉以前，尤集中於府尹一職的任用上，至康熙中期以後，已不再見到選用遼東地區出身的漢族官員。至於外省選任的漢人官員與漢軍八旗，自康熙初年至乾隆十年以前，基本上構成當地官員的主體，而尤以外省籍漢官佔多數，至於漢軍八旗任用，康熙三十年代開始則數量逐漸增多。至乾隆十年以後，隨著乾隆十五年盛京州縣官員定為滿缺，滿族八旗成為主流，雖然乾隆四十一開始又再恢復漢官的選派，但在比例上已大不如前，十年間漢官比例僅佔當時官員總數 39 人之 25%，其餘仍為滿族八旗出身為主，蒙古八旗也緊佔少數。至於蒙古八旗官員任用隨著乾隆十五年後定滿缺後始漸選用，主要派往錦州府以及蓋平、鐵嶺、寧海、錦縣五處。統計順治初年至乾隆後期，出任盛京地方官員共計 375 名，各籍屬任官比例當中，遼東出身漢官 16 名，佔 4.3%；外省籍出身漢官 195 名，佔 52%；漢軍八旗出身 47 名，佔 12.5%；滿洲八旗計 104 名，佔 27.7%；蒙古八旗 13 名，佔 3.5%。

上述統計官員中，滿族八旗佔四分之一強，而幾乎是乾隆十年以後選派。雖然

乾隆四十一年開始，由於州縣滿洲官員因籍屬多袒護旗人，有失公允，遂再度恢復滿漢人員兼用。⁵⁹ 但從乾隆年間盛京地區滿族八旗官員的任用上，仍具體反映乾隆皇帝在當地強化滿洲本位的努力。

與此同時，乾隆年間對瀋陽盛京宮殿的重修與擴建，同樣也反映出乾隆皇帝對這片國朝龍興之處，滿洲根本之地投注更多的心力。瀋陽盛京宮殿始建於清太祖努爾哈齊時期，天命十年（1625），清太祖率眾從遼陽（東京）遷都瀋陽，以此作為後金未來擴張的長久據點。⁶⁰ 現今瀋陽故宮範圍，主要分為東中西三路，其東路所在的大政殿與十王亭，即清太祖遷都之初所興建的宮殿衙署建築群，扮演著滿族入關之初以八旗制度為核心共議國政體制的殿署佈置格局。

清太宗皇太極繼位後，為了提升皇權，徹底削弱八旗貝勒共議國政勢力，另於今瀋陽故宮中路之處興建崇政殿，臨朝聽政，召見大臣，崇德元年（1636）更在此舉行稱帝大典，成為清宮新的正殿，原大政殿為清宮大殿，而十王亭改作八旗各署辦事值辦處所。盛京皇宮地位轉移，既反映出清初軍政體制的特色，也反映國家從八旗諸王共治轉向君主集權的變化。⁶¹

如前所述，當滿族入關以後，瀋陽盛京雖尊崇為陪都，而原來宮殿卻遭冷落荒廢，更因年久失修，部份建築更是垣墉不整，殿宇滲漏，簷柱凹陷。雖然康熙皇帝在位先後於十年（1671）、二十一年（1682）以及三十八年（1699）三次東巡盛京，並下令內務府官員會同工部，歲時對宮殿進行修葺整理，但在康熙、雍正兩朝，並未出現對盛京皇宮進行大規模的修建紀錄。⁶²

然而進入十八世紀乾隆時期，盛京宮殿卻迎來大幅度的擴建與修繕，這些變化，無疑與乾隆皇帝東巡，以及他對作為滿洲發祥地、祖宗肇迹興王之所的重視具有密切關係，當然不可否認，乾隆四十年代國家財政充盈，也得以支撐起他對盛京宮殿大加修葺的經費。

59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9，「繪音二」，〈諭內閣〉，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初一日，頁11a-12a。

60 鐵玉欽、王佩環，〈清政權的奠基地——盛京皇宮〉，收入白壽彝主編，《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頁87-88。

61 鐵玉欽、王佩環，〈清政權的奠基地——盛京皇宮〉，頁93。

62 有關康熙、雍正兩朝對盛京皇宮修繕的論旨，現有各刊本《盛京通志》中僅紀錄康熙十一年的一道命令，內載：「宮殿歲時修理，皆內務府董其事。康熙十一年奉旨會同工部重修。」見(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卷4，〈宮殿志〉，頁2b。

乾隆八年（1743），當乾隆皇帝首次東巡之後，即興起重修盛京宮殿的念頭，並對宮內建築格局進行調整與增建。⁶³ 乾隆十年（1746）首先對原有之崇政殿、飛龍閣與翔鳳閣三處進行修繕，十四年（1749）重修大政殿後鑾駕鹵簿庫。⁶⁴ 除了對原來既有殿閣整修外，從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間，更在崇政殿與鳳凰樓間，左方增建師善齋與日華樓，右方增蓋協中齋與霞綺樓。其他包括東邊的頤和殿、介祉宮、敬典閣；西邊的迪光殿、保極殿、繼思齋與崇謨閣等所，皆是乾隆皇帝第一次東巡後下旨增築。⁶⁵ 此後，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四十八年間，又在宮殿西路進行新的建築工程，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收貯乾隆後期進行文化編纂工程中完成的《四庫全書》，新蓋建築包括文溯閣，閣後的仰熙齋、九間殿，閣前的嘉蔭堂與戲台，屋楹一百餘間。盛京宮殿規模與建築配置，其形成今天瀋陽故宮所見的東中西三路結構格局，皆是在十八世紀乾隆皇帝在位年間完成。這一浩大工程，是在原有清太祖、太宗的基礎上改建與增建，使盛京規制煥然一新，顯現出陪都地位的恢宏氣象。誠如《欽定盛京通志》所云：「於是陪都宮闕，氣象聿新，作極四方，倍加赫奕矣！」⁶⁶

此外，乾隆皇帝更希望將盛京宮殿打造成北京紫禁城、熱河避暑山莊外另一處皇家珍寶典藏處所。除了前述為貯藏《四庫全書》的文溯閣外，舉凡北京紫禁城貯藏的善本、官方刊行的殿本圖冊、以及書畫器物，隨著殿閣的相繼興建，包括《古今圖書集成》、歷朝聖訓、五朝實錄、皇室玉牒、寶冊、書畫、先帝御容、歷代青銅器、漆器、琺瑯器等，皆以最高規格與禮儀的方式，源源不斷地賚送至盛京貯藏。⁶⁷

作為滿族發祥地的盛京，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無論在社會經濟的發展，地方州縣官員任命的變化，皆顯示出乾隆皇帝為這塊政權肇興之處投注更多的關注與經營。而對於盛京宮殿的擴建營建，從乾隆十一年至四十八年，整整長達三十餘年的時間，不僅奠定盛京宏大的規模，建築佈局完整的皇家行宮，也使其從先祖草創之際

63 有關乾隆年間對盛京宮殿整修與增建的討論，參張漢杰，〈論乾隆拓改盛京皇宮的特色〉，《滿族研究》，1999年3期，頁82-88。

64（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20，「宮殿」，頁2b、4b。

65（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20，「宮殿」，頁5a-7a。

66（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20，「宮殿」，頁7b。

67（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20，「宮殿」，頁12a-15b。

偏重軍政意味的宮殿形制，透過清宮皇家典藏與官方出版文物的移入，使之轉化成一座嶄新陪都氣息，也賦與這座留都新的內涵，並注入新的生命。

結 論

中國的文獻編纂，地方志構成一種獨自體系的典籍，各級別的行政單位先後接續編纂其所屬地方歷史，從初修，補修、重修，或重刊等，以各種不同刊本問世，成為中國文化史特有現象。《盛京通志》的編修即是一個最佳的例證，本文透過《盛京通志》編纂與內容分析，具體反映出清代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民族認同與帝王統治政策不同階段的發展與變遷過程。

盛京，作為清代入關前重要的軍政都城，入關後的留都，其在清代都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在當今「故宮學」研究領域中更是佔一席之地。對於這塊王迹肇建之處，滿族根本之地，清初諸帝在維持其政經、種族以及社會等問題上，不同時代反映不同特色，本文透過對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間刊行的五部《盛京通志》，自十七世紀八〇年代至十八世紀八〇年代，時間恰值百年，試圖從中尋找答案，也希望能夠從中勾勒出清代入關後，對這塊龍興之地的態度。

本文主要指出，清初康熙與雍正年間，《盛京通志》編纂的動機，主要與康熙、雍正年間清朝推動《大清一統志》撰修工作具有密切關連。然而進入乾隆年間，皇帝其對盛京地區敕令官員編纂通志的動機，卻與其試圖重振滿族文化等政治手段相聯繫。乾隆皇帝的歷次東巡、《盛京賦》以各種形式的刊行，從歌頌盛京壯麗山河、風俗樸實、物產阜盛，到緬懷先祖創業維艱，訓示子孫克慎守成，以至力圖激發滿族子弟重返祖先創業時耐苦勤奮的開國精神。乾隆年間兩套《欽定盛京通志》的刊行，不僅意欲直彰顯盛京龍興之地的特殊地位，也是藉由《盛京通志》的撰寫，從中喚起滿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凝聚滿族文化共識的手段。

十八世紀乾隆時期，滿族內部面對著日漸提升的認同危機，盛京作為龍興之地、八旗根源，清代統治者自然無法坐視當地隨著漢人移墾擴張以致威脅滿族利益，不僅逐步收緊漢族移民的發展，厲行移民封禁政策，甚至地方官員也改變以滿人取代漢人的方針。與此同時，在國家財政力量支撐下，對先祖草創的盛京宮殿從事長達三十餘年的重修與擴建，拓建成一處規制宏偉，風格獨特並保留滿族氣色的宮殿建築群，成為與關內北京紫禁城相對稱的關外陪都，具有雄踞一方的皇家宮

殿。身為八旗滿族的皇帝，乾隆皇帝希望通過發揚與維護祖先事業從而振興滿洲精神，盛京一地當然是他最佳的選擇。然而，究竟乾隆皇帝這樣的手段是否有達成的目的？看來值得存疑。⁶⁸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皇帝寫下一篇警惕盛京五部官員的詩文中，反映出滿族統治者對陪都盛京地位尊崇，旗人文化卻逐漸衰微的焦慮：

陪都制度規京國，五部原應各備官。
惟一合思鮮咨度，統羣當念倍艱難。
雖云漢語易清語，莫向新觀忘舊觀。
明季末流滋遠異，欽哉六計表衣冠。⁶⁹

時空轉移，百年變遷，盛京轉變的軌跡及其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藉由五部《盛京通志》的解讀，透過文獻學的編纂內容，試圖從中尋找具體例證。

68 有關乾隆皇帝重振滿族文化之努力，學者歐立德同樣也認為其以失敗告終。相關論點可參歐立德（Mark C. Elliott），《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青石譯（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5），頁 127-134。

69（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 17，「天章」，〈示盛京五部侍郎〉（乾隆四十八年），頁 12a-b。

附表一 順治至乾隆年間奉天地區兩府十二州縣官員籍屬分析表

年份	籍屬身份	順治時期	康熙時期						雍正時期	乾隆時期				
		元-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1	元-13	元-10	11-20	21-30	31-40	41-49	
奉天府 府尹	遼東地區	1	2	5	1									
	外省籍屬		1				2	6	4	2				
	漢軍八旗	1		1	2	2	1	2	2					
	滿洲八旗								1		4	3	5	4
承德縣 知縣	遼東地區			1										
	外省籍屬		2	2	4	1	1	1	3	1	2			
	漢軍八旗					2				1				
	滿洲八旗										1		3	2
遼陽州 知州	遼東地區		1	1	1									
	外省籍屬		3	1	1		1	3	2	2	1			1
	漢軍八旗				1		1		1					
	滿洲八旗										2	2	2	1
海城縣 知縣	遼東地區	1	1											
	外省籍屬	1	1	2	2		1	3	5	3	1			2
	漢軍八旗				1	1					1			
	滿洲八旗											1	4	2
蓋平縣 知縣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4	3	2	2		2	1	5				
	漢軍八旗								1	1				
	滿洲八旗										1	1	3	1
開原縣 知縣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2	2			1	4	2		1			
	漢軍八旗							1						
	滿洲八旗				1	1					2	1	2	2
鐵嶺縣 知縣	遼東地區				1									
	外省籍屬		1	1		1	1	2	4	1	2			1
	漢軍八旗					1			1					
	滿洲八旗										1	3	4	
復州 知州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1	1	1			1
	漢軍八旗													
	滿洲八旗											1	4	1

		順治時期	康熙時期						雍正時期	乾隆時期			
寧海縣 知縣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1	2	1			1
	漢軍八旗												
	滿洲八旗										1	1	2
	蒙古八旗											1	
錦州府 知府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1		2	1		3	1	1				
	漢軍八旗					2		2	1				
	滿洲八旗							2		1	1	2	
錦縣 知縣	遼東地區	1											
	外省籍屬	4	1	3	3	1	2	4	6	1			1
	漢軍八旗												
	滿洲八旗									2	1	5	2
寧遠州 知州	遼東地區	1		1									
	外省籍屬		2		1		1	4	2	3			
	漢軍八旗	2	1	2	2	2	1	1					
	滿洲八旗										2	1	3
廣寧縣 知縣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2	2	1		1	1	7	4	2			2
	漢軍八旗	1			1	1	1	1					
義州 知州	遼東地區												
	外省籍屬							1		1			
	漢軍八旗								1				
	滿洲八旗									1	2	1	2

資料來源：(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卷14，「職官」；(清)廖騰燧等增修，《盛京通志》(康熙五十年刊本)，卷14，「職官」；(清)呂耀曾、宋筠等纂修，《盛京通志》(乾隆元年刊本)，卷20，「職官」；(清)汪由敦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十三年刊本)，卷14下，「職官」；(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卷41-42，「職官三」、「職官四」。

附表二 五部《盛京通志》各卷次簡表

	康熙二十三年 《盛京通志》	康熙五十年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 《盛京通志》	乾隆十三年 《欽定盛京通志》	乾隆四十九年 《欽定盛京通志》
卷之 1	京城志	京城志	典謨志 詔	聖製	聖製一
卷之 2	壇廟志	壇廟志	典謨志 序記	聖製	聖製二
卷之 3	山陵志	山陵志	典謨志 碑文 頌 贊文	聖製	聖製三
卷之 4	宮殿志	宮殿志	典謨志 詩	御製	聖製四
卷之 5	苑囿志 (各庄附)	苑囿志 (各庄附)	京城志	京城 壇廟 宮殿 山陵	聖製五
卷之 6	建置沿革志	建置沿革志	壇廟志	星土 建置沿革 疆域形勝	聖製六
卷之 7	星野志 (祥異附)	星野志 (祥異附)	山陵志	山川上	聖製七
卷之 8	疆域志 (形勝附)	疆域志 (形勝附)	宮殿志	山川下	繪音一
卷之 9	山川志	山川志	苑囿志 (牧政附)	城池	繪音二
卷之 10	城池志	城池志	建置沿革志	關郵 (津渡舖 遞附)	天章一
卷之 11	關梁志 (邊門船 艦附)	關梁志 (邊門船 艦附)	星野志 (祥異附)	戶口	天章二
卷之 12	驛站志 (舖遞附)	驛站志 (舖遞附)	疆域志 (形勝附)	田賦 (旗田稅 課附)	天章三
卷之 13	公署志	公署志	山川志	職官上	天章四
卷之 14	職官志	職官志	山川志	職官下	天章五
卷之 15	學校志	學校志	城池志	學校 公署	天章六
卷之 16	選舉志	選舉志	關隘志 (橋樑船 艦附)	選舉	天章七
卷之 17	戶口志	戶口志	驛站志 (舖遞附)	兵防	天章八
卷之 18	田賦志 (稅課官 庄、八旗田畝附)	田賦志 (稅課官 庄、八旗田畝附)	公署志	名宦	京城
卷之 19	風俗志	風俗志	職官志	人物	壇廟
卷之 20	祠祀志	祠祀志	職官志	人物	宮殿
卷之 21	物產志	物產志	學校志		山陵
卷之 21 上				人物	
卷之 21 下				人物	

	康熙二十三年 《盛京通志》	康熙五十年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 《盛京通志》	乾隆十三年 《欽定盛京通志》	乾隆四十九年 《欽定盛京通志》
卷之 22	古蹟志(陵墓附)	古蹟志(陵墓附)	選舉志	忠節 孝義 文學	星土
卷之 23	帝王志(后妃附)	帝王志(后妃附)	戶口志	隱逸 流寓 方伎 仙釋	建制沿革(表一 考一)
卷之 24	名宦志	名宦志	田賦志(旗田稅 課附)	列女	疆域形勝
卷之 25	人物志	人物志	風俗志	祠祀 古蹟(陵 墓附)	山川一
卷之 26	孝義志	孝義志	祠祀志	風俗 物產 雜誌	山川二
卷之 27	列女志	列女志	物產志	藝文	山川三
卷之 28	隱逸志	隱逸志	古蹟志(陵墓附)	藝文	山川四(古山川 考附)
卷之 29	流寓志	流寓志	帝王志(后妃附)	藝文	城池一
卷之 30	方伎志	方伎志	名宦志(忠節附)	藝文	城池二
卷之 31	仙釋志	仙釋志	名宦志(忠節附)	藝文	城池三
卷之 32	藝文志	藝文志	人物志	藝文	城池四
卷之 33			人物志		關郵
卷之 34			人物志		津梁(船艦附)
卷之 35			孝義志		戶口一
卷之 36			孝義志		戶口二
卷之 37			列女志		田賦一
卷之 38			隱逸志		田賦二(旗田官 莊稅課附)
卷之 39			流寓志		職官一
卷之 40			方伎志		職官二
卷之 41			仙釋志		職官三
卷之 42			藝文志 歷代 詔敕 文 詩辭		職官四
卷之 43			藝文志 表疏		學校一
卷之 44			藝文志 記		學校二
卷之 45			藝文志 序書		官署一
卷之 46			藝文志 傳文 銘 賦 歌辭		官署二

	康熙二十三年 《盛京通志》	康熙五十年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 《盛京通志》	乾隆十三年 《欽定盛京通志》	乾隆四十九年 《欽定盛京通志》
卷之 47			藝文志 詩		選舉一
卷之 48			雜志		選舉二
卷之 49					選舉三
卷之 50					選舉四
卷之 51					兵防一
卷之 52					兵防二
卷之 53					名宦一
卷之 54					名宦二
卷之 55					名宦三
卷之 56					名宦四
卷之 57					名宦五
卷之 58					歷朝人物一
卷之 59					歷朝人物二
卷之 60					歷朝人物三
卷之 61					歷朝人物四
卷之 62					歷朝人物五
卷之 63					歷朝人物六
卷之 64					歷朝人物七
卷之 65					國朝人物一
卷之 66					國朝人物二
卷之 67					國朝人物三
卷之 68					國朝人物四
卷之 69					國朝人物五
卷之 70					國朝人物六
卷之 71					國朝人物七
卷之 72					國朝人物八
卷之 73					國朝人物九
卷之 74					國朝人物十
卷之 75					國朝人物十一
卷之 76					國朝人物十二

	康熙二十三年 《盛京通志》	康熙五十年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 《盛京通志》	乾隆十三年 《欽定盛京通志》	乾隆四十九年 《欽定盛京通志》
卷之 77					國朝人物十三
卷之 78					國朝人物十四
卷之 79					國朝人物十五
卷之 80					國朝人物十六
卷之 81					國朝人物十七
卷之 82					忠節一
卷之 83					忠節二
卷之 84					忠節三
卷之 85					忠節四
卷之 86					忠節五
卷之 87					孝義
卷之 88					文學
卷之 89					隱逸
卷之 90					流寓
卷之 91					方伎
卷之 92					仙釋
卷之 93					列女一
卷之 94					列女二
卷之 95					列女三
卷之 96					列女四
卷之 97					祠祀一
卷之 98					祠祀二
卷之 99					祠祀三
卷之 100					古蹟一
卷之 101					古蹟二
卷之 102					古蹟三
卷之 103					古蹟四
卷之 104					古蹟五(陵墓附)
卷之 105					風俗
卷之 106					物產一

	康熙二十三年 《盛京通志》	康熙五十年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 《盛京通志》	乾隆十三年 《欽定盛京通志》	乾隆四十九年 《欽定盛京通志》
卷之 107					物產二
卷之 108					雜志
卷之 109					列朝藝文一
卷之 110					列朝藝文二
卷之 111					列朝藝文三
卷之 112					列朝藝文四
卷之 113					列朝藝文五
卷之 114					列朝藝文六
卷之 115					國朝藝文一
卷之 116					國朝藝文二
卷之 117					國朝藝文三
卷之 118					國朝藝文四
卷之 119					國朝藝文五
卷之 120					國朝藝文六
卷之 121					國朝藝文七
卷之 122					國朝藝文八
卷之 123					國朝藝文九
卷之 124					國朝藝文十
卷之 125					國朝藝文十一
卷之 126					國朝藝文十二
卷之 127					國朝藝文十三
卷之 128					國朝藝文十四
卷之 129					國朝藝文十五
卷之 130					國朝藝文十六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伊把漢等纂，《盛京通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 (清)呂耀曾、宋筠等纂修，《盛京通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元年刊本。
- (清)李衛修，《畿輔通志》，收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 (清)汪由敦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本。
-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 (清)阿桂等奉敕撰，《欽定盛京通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四十九年內府朱絲欄寫本。
- (清)阿桂等編纂，《欽定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九年《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 (清)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收入《續收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 1416。
- (清)萬邦維修；衛元爵等纂，《萊陽縣志》，康熙十七年刻本。
- (清)廖騰焯等增修，《盛京通志》，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康熙五十年刊本。
- (清)戴衢亨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文淵閣寫本。
-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世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清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近代論著

- 丁海斌、時義，《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刁書仁，〈清初遼東招民開墾令與遼東地區的農業開發〉，《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4期，19卷，頁51。
- 刁書仁，〈論乾隆朝清廷對東北的封禁政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6期，頁83-90。

- 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 牛潤珍、張慧，〈《大清一統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2008年1期，頁136-148。
- 王益朋，〈為請定豐鎬神區規制仰祈敕議修舉以重萬世根本事〉，收入仁和琴川居士編，《皇清奏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10，頁34a-39a。
- 田志和，〈論清代東北行政體制的改革〉，《東北師大學報》，1987年4期，頁59。
- 李國亮，〈清初「遼東招民墾田授官例」研究〉，甘肅：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
- 杜家驥，〈清改瀋陽為盛京考述〉，《滿族研究》，1997年4期，頁36-37。
- 孟繁勇，〈清代盛京將軍與陪都機構權力關係的演變〉，《社會科學輯刊》，2009年3期，頁128-135。
- 林士鉉，〈皇矣陪都·實惟帝鄉——乾隆皇帝與滿、漢文《御製盛京賦》〉，《故宮文物月刊》，367期，2013年10月，頁52-67。
- 邱富生，〈試論清代方志的纂修〉，《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86年4期，頁78。
- 邱富生，〈遼寧方志述略〉，收入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編，《中國地方史志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82。
- 金恩輝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臺北：和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冊上。
- 徐雪梅，〈淺析清朝奉天文官選任的民族選擇性〉，《北方文物》，2011年3期，頁81-83。
- 徐雪梅，〈淺議清朝奉天府尹的選任〉，《東北史論》，2012年3期，頁57-59。
- 秦麗娜、季秋華，〈彌足珍貴的康熙本《大清一統志》〉，《圖書館建設》，2001年6期，頁105-106。
- 馬可寧，〈銀岡書院的創始與發展〉，《北方文物》，1999年3期，頁91-94。
- 張杰，〈試論清前期的東北封禁〉，《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5期，頁118-120。
- 張漢杰，〈論乾隆拓改盛京皇宮的特色〉，《滿族研究》，1999年3期，頁82-88。
- 張豔玲，〈三部《大清一統志》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論文，2003。
- 陳加，〈盛京通志纂修考〉，《圖書館學刊》，1980年3期，頁50-57。
- 喬治中，〈《大清一統志》的初修與方志學的興起〉，《齊魯學刊》，1997年1期，頁115-122。
- 賀飛，〈清初「遼東招民開墾例」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楊小梅，〈清帝東巡及對瀋陽文化的影響〉，《蘭臺縱橫》，2105年5期，頁72-73。
- 管東貴，〈清初遼東招墾授官例的效果及其被廢原因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4本2分，1972年，頁235-240。
- 趙秉忠，〈清朝前期對東北地區的管轄〉，《歷史教學》，1981年6期，頁57-59。
- 趙秉忠，〈論清帝東巡〉，《社會科學輯刊》，1994年5期，頁121-127。
- 劉曉玲，〈清康熙朝東北方志文獻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青石譯, 臺北：八旗文化出版社, 2015。
-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撰；溫清梅譯, 〈清八旗的種族性〉, 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 《清朝的國家認同》,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0, 頁 119-125。
- 薛虹, 《中國方志學概論》,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4。
- 謝景芳、趙洪剛, 〈郝浴父子與奉天鐵嶺銀岡書院〉, 《明清興替史事論考》,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 頁 297-307。
- 鐵玉欽、王佩環, 〈清政權的奠基地——盛京皇宮〉, 收入白壽彝主編, 《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0, 頁 87-88。

A Century of Change: A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General Gazetteer of Shengjing* and Its Contents

Cheng, Wing-cheong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In regional studies of northeastern Chinese history, *General Gazetteer of Shengjing* without a doubt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often chosen by scholars for citation. However, as far as this gazetteer is concerned, very little has been studied in relation to its contents and editions. At present, there are five surviving editions of *General Gazetteer of Shengjing*, the compilation spanning the early Qing in the Kangxi reign to those of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 starting in the early 1680s and culminating in the 1780s. Covering nearly a century, the compilation fully embodies in concrete terms official viewpoints on compiling the history of the region around the old capital of Shengjing. At the same time, this gazetteer also reflects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in terms of the peopl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the Shengjing area.

The five official editions of the *General Gazetteer of Shengjing* include from the Kangxi reign a printed one of 1684 and a 1717 one with revisions. And from the Qianlong reign is a 1736 one with additions, a completely revised one from 1748, and a 1784 one with additions and revis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by analyzing the five editions of this gazetteer to understand bett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ts compilation, the process of transcribing additions and revisions to the text, and how the contents reflect the changes over history at the secondary capital of Shengjing in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a hundred year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Keywords: Northeast, Shengjing, secondary capital, *General Gazetteer of Shengjing*, historical chang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